

近读录

纸上聊天

止庵

二自一月起管我一部分用费,担任若干尚未说明。贤媳经济情形亦深悉,希斟酌现状,每月能寄出若干寄我转付家用,再行核夺可也。”按这里所说的“一月”当指次年即一九三九年一月。然而再看宋琳1937年10月21日致许广平：“八道湾太师母月费仍照常送来,约每月来探视一次,二先生因学校停止,颇受影响。”

《钓台随笔》中《一片晚秋枫叶落了》一文中说：“我与李霁野先生聊天的内容,除了他感兴趣的国内外大事及当前热门话题,就是与鲁迅有关的人和事了。例如关于鲁迅与朱安夫人的关系,我曾告诉李先生,坊间有本专谈鲁迅、许广平、朱安三人感情纠葛的书。作者说,有一次朱安为鲁迅缝制了一条新棉裤,放在鲁迅的床上,满指望他能穿上,但鲁迅却把它扔出门外,使朱安非常伤心。李先生斩钉截铁地说,鲁迅绝不可能这样做,鲁迅对朱安虽然没有爱情,但平常相敬如宾,对她的态度还是好的。李先生每次去鲁迅家,都是朱安出来端茶送水,从未见到鲁迅对朱安有什么不尊重的表现。有一次,李先生与台静农、韦素园三人去鲁迅家,临别时鲁迅对他们说:‘明天你们三人来我家吃晚饭。’当时他们听了有点奇怪,但第二天还是按时赴约了。鲁迅说:今天是我的生日,邀你们来热闹热闹,妻子特意做了家乡口味的酥鸡,让你们尝尝。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鲁迅的家里还是有一种夫妻和睦的气氛的。李先生曾几次跟我谈,他想专门就此写篇短文,以澄清这种不实的误传。”按“扔棉裤”一事,见于孙伏园《哭鲁迅先生》(1936年11月《潇湘杂志》第二卷第八期):“一天我听周太太说,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,已经补过多少回,她实在看不下去了,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,等鲁迅先生上街的时候,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,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,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。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,所以让我劝劝他。鲁迅先生给我答复却是不平服的:‘一个独身的生涯,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。岂但我这穿棉裤而已,你看我的棉裤,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裤,我不愿意换,你再看看我的辅被,我从来不愿意换藤蓆或棕蓆,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。生活太安逸了,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。’是以李霁野的相关质疑,未必确凿;然而他所补充的关于鲁迅与朱安关系的回忆,假如属实的话,自可以与此并存。“并存”至少比那种单凭印象(其实是人云亦云)得出的简单化、片面化的判断,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。

我与林谷先生久未见面,又不常通音问,不免闲聊地拉杂说了很多,就此打住。这本书印得很好,假如提点意见,就是大概是出版社给配的那些图实在可有可无,达不到与文“并茂”,然亦一己之见而已。

汪曾祺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同学的散文中说:西南联大的“几个研究生被人称为‘无锡学派’,无锡学派即钱锺书学派,其特点是学贯中西,博闻强记”(《未完才——故人传记》)。“钱锺书研究”已成“显学”,但素无“钱锺书学派”之说。此说是一条重要的现代学术史的史料,可见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学术影响。当时的钱锺书还是刚刚留学归来直接任职西南联大的年轻教授,并且仅仅工作一年即离职,他的学术著作《谈艺录》和小说《围城》、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等的出版,还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,那么这种巨大的学术影响因何而来?这实在耐人寻味,亦可谓现代学术之“传奇”。此前,类似的“传奇”,仅有20年代陈寅恪应聘清华大学及其巨大的学术声望。

汪曾祺一再赞同钱锺书的著名的“打通”说。《作家应当是通人》开头即云:“钱锺书先生说这些年在中西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是‘比较’,而是‘打通’。我很欣赏‘打通’说。”整个20世纪,文学研究真正能够“打通”中西者,朱光潜、钱锺书之外,还有何人?今日“比较文学”研究,“打通”者凡无不通者。反倒是文学创作,大家、名家者,鲁迅、如堂以下,大都中西“打通”。汪曾祺当然在“打通”者之列。在这篇文章中,汪曾祺立论创作应该“打通”,对钱锺书的“打通”之说,作了独到的发挥:不仅“中西文学的打

张政烺先生生前我称他老人家“张伯伯”。他与我父亲胡厚宣先生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同学,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,最后又同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职。

现在我个人所见张伯伯与我父亲最早的一幅合影,是在1937年5月18日史语所南迁时在长沙“中国艺术史学会”成立当天所摄。照片中有我父亲在北大的老师马叔平先生,在史语所的老师徐中舒、梁思永先生,前辈朱希祖、胡小石,友人商锡永、滕固、常任侠,张伯伯也在其中。“艺术史学会”概由滕固发起,首先,我父亲曾写有一篇“全国第二次美展”《中央研究院殷墟出土展品参观记》,收入滕固编的《中国艺术论丛》,而张伯伯藏书之中亦有一册滕氏所译《先秦考古学方法论》。

张伯伯有一幅照片,摄于南京鸡鸣寺史语所楼前,丁榕梓先生站在其后。1998年5月振宇赴台参加“甲骨文百年会”,其间曾往石璋如先生办公室,因为石伯伯母校河南大学百年庆典,拟由振宇写一《石璋如先生与商代文化研究》(后刊于《史学月刊》1999年第1期),把初稿请他过目,顺便我也向石伯伯询问有无早年照片,因为殷墟发掘之时,石先生专门负责照相。待我离开史语所时,石伯伯交我数张照片,其中一张背后注明是我父,但我却看照片中人极似丁声树先生。回京后,我拿着这张照片去协和医院看望张伯伯,顺便请他老人家帮忙辨认,那时张伯伯还能言语,却只是瞪大眼睛专注地看了半天,若有所思,未发一言。

张伯伯晚年时常与我父亲共同出席各项活动,有时我也陪同一道,这期间曾聆听许多张伯伯的高论。因为两位老人是自青年时就相识,所以无话不谈,张伯伯也不拿我当外人,对许多事物的

多年前我在韩国济州岛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。这所大学远离市区,校园很大,林木茂盛,环境非常清幽。老师、学生一般不住校,下课后返回市内,偌大的校园人迹寥寥,更显幽静。学校建在郊外的山坡上,旁边就是济州岛也是韩国的最高峰汉拿山,学校外则是封闭了的自然保护区,里面杂草丛生,沟壑纵横,查无人迹,堪称鸟兽的乐园。我住的教授公寓楼在半山坡上,往下是一条悠长的林阴道,四季风景如画,经常可以看到远道而来的新郎、新娘来此拍婚纱照。

校园里视野极为开阔,丘陵起伏,树木茂密,教学楼掩映其中,颇有情趣。学校在教区之外还专门辟有一片山坡园林,供师生游玩,休憩。园林区山路弯弯,曲径通幽,沿途设有欧式



笔会

大海无量 (水印木刻) 陈波

看法,人物的评价,自己的经历,以至戏剧时尚等等,都有涉及,且句句大实话。振宇今日还能回想起张伯伯谈话时的语调神态及动作手法。

1994年初,在台北的史语所召开“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研讨会”,特邀所中在大陆的前辈张伯伯及我父亲两位。而振宇获准陪同前往,在我们刚抵台北机场时,前来迎接的史语所所长就特别转达两位的老友陈槃庵先生之邀。当我们前往陈公馆探访时,陈先生已不能言,概由陈夫人代为转达,张伯

济州岛的野趣

耿传明

的仿古路灯,一路走来,如入世外桃源,美不胜收。刚到学校,我与一位同事去园中散步,没走多远,他居然在路旁的树荫下,捡到了一个碗口大、紫金色的野生灵芝,他喜出望外。灵芝又称林中灵、琼珍,是中国古代象征祥瑞的仙草,在中医里具有补气安神、延年益寿的功效。野生的灵芝不太多见,他能

在路边捡到灵芝,说明此地的幽僻、静谧,自然生态保持极好。我到济州岛不久,就进入了深秋时节,同事拉我到海边的一个酒馆就餐。这个酒馆建在深入海中的栈桥之上,正值黄昏,海边风大浪高,波涛汹涌,巨浪强劲地拍打在岸边深黑色的火山岩柱之上,激起一丈多高的浪花,颇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古大气象。济州岛的海产品丰富,我们那次聚餐主要吃的是生鱼片,此前我从未吃过生肉,有一定的心理障碍,但蘸着芥末汁尝了一点之后,感觉还不错,并无明显腥味,有一种淡淡的清香。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《秋刀鱼之味》,流露出的也正是这种清波、鳧鱼的味道,它所展现的未经加工、朴素自然的生活本色。

济州岛的地貌很独特,它是120万年前火山活动而形成的岛屿,由火山喷发而形成。它的地质结构由堆积岩层、玄武岩、火山熔流及因火山活动而形成的火山碎屑岩等构成,属于典型的熔岩洞窟地形。济州岛上的火山石多为深黑色,上面布满蜂窝状的气孔,拿起来很轻,可以把它加工成搓澡石来用,常见街上的商店将它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。济州岛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,他们崇拜的神叫多哈鲁鲁,又叫石头爷爷,岛上到处可见他的石像。

济州岛最著名的景点应该是汉拿山,汉拿山意为“能拿下银河的高山”,如果不爬汉拿山,便枉来了济州岛,与中国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意思相近。到济州岛不久,我在朋友的带领下,专门去爬了一次汉拿山。爬山之前,我们先到山下古代祭祀山神的祭坛去看了一下,祭坛很简朴,就是一个石制的香炉,只是两侧有数棵高耸入云的参天古松,特别引人瞩目。就像王安石诗中所

伯见到老朋友,还趋前说道:还认得不认得?其间又问起陈先生的家乡老弟的情景。陈先生精心准备了礼物。送给我父亲的是他的名著《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疏异》、《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考》,送给张伯伯的是亲作的诗(陈先生早年在所中就有“诗人”之称)。临行时史语所方答应可帮邮寄获赠的书籍,张伯伯还一再叮嘱,内中有珍贵的诗作。不知陈先生硬笔书写的诗作今日是否尚在。

近年来,我在整理父亲的著作时,也翻检出数封父亲保存的张伯伯来函。文如其人,字里行间显露出张伯伯的性格,如说乙编下册,“此书中有用之材料不多,颇使人失望,反不如续存”。读到《殷墟发掘》,称“看到许多金文拓片,尤令人有如恍如隔世之感”。但“可惜图排一排版误倒,为美中不足”真的像傅斯年先生说的,是“最critical”的。

张伯伯的书法,是他自认为得意的,他也同我说过,认定“书法家”,启动可以给出证明的话语。我也曾想写一幅墨宝,张伯伯总是笑着说:我们是自己人,回去再说。但回家后,又忙各的,终究没有下文了。张伯伯的著作中,写甲骨的不多见,我个人也仅见三幅,北大文研院正在举办的“张政烺先生学行展”展品中得见第四幅。美国已故吉德炜教授有一幅,是1987年安阳殷商会上所,挂在他的家中。相同内容的范缜周也有一幅。其中有“我来学习”的字句,我想这也是我参加这次纪念会的目的。

张伯伯的书法,是他自认为得意的,他也同我说过,认定“书法家”,启动可以给出证明的话语。我也曾想写一幅墨宝,张伯伯总是笑着说:我们是自己人,回去再说。但回家后,又忙各的,终究没有下文了。张伯伯的著作中,写甲骨的不多见,我个人也仅见三幅,北大文研院正在举办的“张政烺先生学行展”展品中得见第四幅。美国已故吉德炜教授有一幅,是1987年安阳殷商会上所,挂在他的家中。相同内容的范缜周也有一幅。其中有“我来学习”的字句,我想这也是我参加这次纪念会的目的。

看完整坛,我们开始去登顶汉拿山。汉拿山主峰海拔高度为1,950米,与中国的华山、五台山等相比都低一些,但爬起来颇为不易,因为最大程度保留了山的原始面貌,没有为方方便游客登山而过度开发,如砌台阶、建缆车之类。上山的路很狭窄,陡峭,有时连台阶也没有,只能手足并用地上去。登顶汉拿山虽然辛苦,但也确实让登山者体会到了乐趣。

居韩一年,我的重要收获是得到了一次难得的与自然亲密接触,乃至完全融入其中的机会。有一些记忆深刻的场景至今难以忘怀——如初春时节,黑黝黝的樱树枝丫上突然开出粉红色的硕大、艳丽的花朵,仿佛一夜之间由冬天迈入到了春天,校园内外,十里花海,芬芳馥郁,徜徉其中,令人醉而忘返。再如夜间的静寂中,突然听到室外山涧里清脆响亮的蛙鸣,令人精神一振,仿佛触摸到了宇宙自身生命的律动,南宋张九成的诗句“春天河夜一声蛙,撞破乾坤共一家”,大概写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。夏日一微电闪雷鸣之后,小溪暴涨,成为湍流,冲击岸边的野草,如同野人头上披拂的长发。秋日雨后,林阴道上落满了金黄色的树叶,一眼望去,仿佛是一条黄金长廊。冬日午后,在室外窗台上撒一把小米,很快就会招来山雀啄食,顿感生机盎然。人的心灵是不能离开这种来自大自然的滋养的,它能使活得更像个人,而不是个机器。

2017年10月22日天津

汪曾祺与钱锺书

高恒文

“科学”之类的议论,而且人物也爱“发议论”,诸如“局部的真理”、“熟食辅子”等等,最著名的关于婚姻是“金丝鸟笼”还是“围城”。

不过汪曾祺说:“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在小说里发议论,但议论必须很富于机智。带有讽刺性的小说常有议论,所谓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。”(《说短》)《围城》不就是讽刺小说吗?《围城》中的议论正是以“机智”著名!诗人、散文家余光中说:“小说家钱锺书往往不甘隐身为幕后,忍不住会从旁指指点点,像是说书人。说书人太有个性,太有趣了,就算他借题发挥,暂时把故事搁在一边,我们也乐得姑妄听之,因为太好听了”;“《围城》最好听的部分是每章的起头跟其后穿插应应的夹叙夹议。其议并非正规的理论,而是富于情趣甚至情趣的”(《新儒林外史——悦读钱锺书的文学创作》)。此说可窥钱汪曾祺所谓的“机智”。余光中还说:《围城》中的议论,“短一点的一闪即逝,有如妙想联翩旋生旋灭的水泡,钱

锺书重视黄诗,也表明了钱锺书对黄诗的出处、来历这一艺术特征的重视。钱锺书的诗,受宋诗尤其黄庭坚诗的影响,是很大的。然而他在《宋诗选注》中,却不得不严厉批评黄庭坚诗和江西诗派的注重出处、来历,称为“形式主义”。尽管我们知道,他的这种批评,固然是因为迫于时势,但还是巧妙的修辞技巧,皮里阳秋,否定的只是讲究出处、来历的弊习,并未完全否定这一艺术技巧本身,并且主要是拿江西诗派的末流开刀,而反对对黄庭坚以及苏轼、王安石等人的佳作,不措篇幅,特意指出某一句、某一联的出处、来历:黄庭坚《病起荆江亭即事》之一句“时有归牛浮鼻过”;是宋诗,并且是“点铁成金”;《书湖阴先生壁》最后两句“这是比较健康的‘用事’的例子”,符合中国古代修辞学对于“用事”最高的要求:“用事不使人觉,若胸臆语也”。汪曾祺论“来历”时还说:“我们许多的语言,自觉或不自觉地,都是从前人的语言中脱胎而出的。如果平日留心,积学有素,就会如有源之水,触处成文。”前一句近乎“若胸臆语也”之意,后一句强调“积学有素”,是和黄庭坚的思想一致的。

关于汪曾祺与钱锺书,可说的还有几点,比如“老妪都解”、黄庭坚书法等等,兹不赘述。



“文汇报” 微信二维码